

“名实相生”与“名实相怨”

——明清小说的一书多名现象

■王晴川

小说如商品，一个好的名称，能给消费者留下深刻印象，并刺激他们的购买欲望。1925年，刘恨我在《小说一得》中说：“一篇好小说，无好题目，必定减色不少；有好题目，无好结构，亦然。”小说题名是最先入读者之耳目的，如果题名新颖别致，符合读者的阅读期待，就能助益小说的销售。

在中国古代出版史上，代表精英文化的经史子书，出版商一般不敢改纂，但小说地位向来很低，面向的是普罗大众，因而就少有顾忌，常随意改易书名，造成一书多名的现象。清末邱炜菱在《菽园赘谈》中指出：“近来沪上牟利书贾，取时贤所著说部，改易名目，以期速售。”其实这是明清小说史上的普遍现象，笔者据欧阳健、萧相恺主编《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》粗略统计，该书收录小说有异名者多达二百多部，而且很多小说不止一个异名，有的多达十余个。

有的小说在写作、传抄、成书、出版等过程中，就产生过多个书名。如《红楼梦》开头写石头将自己“历尽离合悲欢炎凉世态的一段故事”“编述一集”，名“石头记”；空空道人因读小说而悟道，故名“情僧录”；孔子后裔孔梅溪则从警世角度揭示小说主旨，曰“风月宝鉴”；而曹雪芹更关注女儿们的命运，在“悼红轩”中增删成书后改名“金陵十二钗”；程高本刊行时题名“红楼梦”，因此书名既富有诗意又深刻揭橥了小说主题，获得后世读者认可。小说的命名方式很多，1908年徐念慈在《余之小说观》一文中概括道，“有短至一二字者，有多至成句者，有以人名者，有以地名者，有以一物名者，有以一事名者……种种方面，总以动人之注意为宗旨。”这也从另一侧面道出了小说一书多名的一些原因，笔者认为莘莘大者有二：

第一，读者阅读体验的差异。阅读活动受到读者个性喜好、知识结构和历史背景等诸多因素的影响，遂会产生不同的阅读体验。很多

小说再版时，书商或编辑作为特殊读者，会按照自己的理解改定书名，如《画图缘小传》突出的是画图在故事中的作用，清刻本改为《画图缘平夷全传》，更强调“平夷”，正祖令贤堂本改为《花天荷传》，则以人名。此类情况甚夥。有时书商对小说中谁是主人公会产生分歧，如碧梧山庄本《韩湘子全传》内封题“韩昌黎全传”。明小说《禅真逸史》本以僧传名，清末石印本以寺名改为《妙相寺全传》，又以史名改为《残梁外史》。有的读者对小说中的武打内容感兴趣，如《南北两宋志传》晚清再版时易名为《北宋金枪传》，突出杨家将所使用的兵器。出版商还看重小说的劝惩功能，如《绣戈袍全传》本以物命名，后改名《果报录》。《续小五义》后来刊行时增加“忠烈”两字，《林兰香》的清代坊刻本改名为《美益奇观孝义传》，都是凸显因果报应、忠孝节义思想。

书商还善于蹭热点，紧扣读者的趣味。如晚明内忧外患，时代呼唤英雄，故书商将《三国演义》《水浒传》合刻改为《英雄谱》。为正如日中天的吴三桂唱赞歌，清初《剿闯通俗小说》改为《忠孝传》。鸦片战争爆发，国人开始产生海洋意识，为更能吸引读者，《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》咸丰本改为《三宝开港西洋记》。清末改良派提倡“白话为维新之本”，小说书名也与之呼应，如《何典》光绪本改为《十一才子书鬼话连篇录》，等等，通俗易懂，令人喷饭。

有的小说有多个书名，从不同侧面体现了读者的阅读关注点，如清初《新世宏勋》歌颂清军创业立国，后再版时有过很多异名，如《铁冠图全传》以书中铁冠道人的图画命名，《顺治过江》以清军过长江为鼎革之关节，《定鼎奇图》则把图画与清廷建国扭结在一起。其他还有《雷峰塔奇传》等小说，皆是如此。

第二，书商的销售策略。潘建国曾指出，晚清通俗小说翻印的一大弊端就是改换小说题

目，欺世取售。其法五花八门，或攀附经史及小说名著，在书名上贴上所谓“志”“传”“纪”等标签；或称是“外史”“外传”“逸史”“秘史”等，有的与历史毫无关系，如《封神演义》改为《商周列国全传》。特别是傍名牌，刘廷玑《在园杂记》说：“每见前人有书盛行于世，即袭其名，著为后书副之，取其易行，竟成习套。”四大小说名著自不必说，有以“奇书”改名者，如《艳镜》又名“三续”“四续”《今古奇观》，《石点头》又名《五续今古奇观》等。有以“才子书”标榜者，如《好逑传》为《第二才子书》，《两交婚小传》为《续四才子书》等，都是希望通过傍名牌，产生附骥效应。

由此可见，明清小说一书多名现象的产生，与作者、读者、出版商都有关系，是当时社会思潮、读者心理、文坛风习及商业经济等状况的折射，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小说的销售和传播，但弊端也不容忽视。有的小说题名“按实定名”，“名生于真”，因而产生“名实相生，利用相成”的艺术效果，促进了小说的传播；有的则粗暴更名，造成“名实相怨”，“反相为情”，即书名与内容割裂，甚至毫无关系，如光绪间出品的小说《白云塔》曾改名《新红楼》，其实与《红楼梦》“风马牛不相及”。此类不胜枚举，出版商唯利是图，侵害作者和读者的权益，破坏了小说创作生态。叶小凤在《小说杂论》中批评晚清小说道：“今之定小说名者，非不能研究，病在弃文以昵人，于是择辞必妍，定名必巧，花草情恨，钗钏梦泪等字杂见于首页，千书一律，转令见者不知其所言何事，所称何人。”心父在《出版界之每况愈下》中感慨道：从前出版书籍，先考究内容，再斟酌书名，最后才看作者。后来便不然了，变成首看作者名头，次看书名，至于书的内容怎样，倒是顶小的问题。到了现在，风气又大变，书的内容和作者名字皆无关紧要，而变成唯书名是从，越俗越好。这一演变过程，造成小说质量陡降，出版商难辞其咎。

（据《光明日报》）

文化评析：审“时”度“势”传承地方戏曲

■史册

习近平总书记10月23日给中国戏曲学院师生回信，对传承发展好戏曲艺术提出了殷切期望，这是对戏曲传承的关怀，也是对戏曲发展生态提出的更高要求。落实总书记的重要指示，需要我们挖掘中国戏曲的时代性，将戏曲传承与时代精神进行关联性思考，从一种审“时”度“势”的视角评估戏曲，尤其是地方戏曲的人才传承、发展机遇、未来态势。

中国戏曲作为世界最早的三大戏剧源流之一，基于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、广阔的地域，形成了不同地区300余个具有浓郁地方特色、深厚文化内涵和独特审美特征的地方剧种，并在差异化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共同作用下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文化戏曲生态系统。当下，除了受众广泛的京、评、豫等核心戏曲剧种外，地方戏曲如何当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媒介，成为我们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。

新中国成立以来，大量的地方戏曲剧种涌出，至今仍有一大批活跃在舞台上的经典地方戏曲作品。近年来，地方戏曲发展整体情况良好，但在创作成果、剧目传播力、观众观剧热情上都不温不火，精品力作并不多见，特别是剧种人才的培养与剧种在人民群众中的普及度，更是需要引起重视与关注。

新的时代背景下地方戏曲的传播效果，首先取决于观众以什么样的方式欣赏、接触地方戏曲。地方戏曲同其他艺术形式一样，受到媒介变革的冲击与影响，使戏曲创作与表演的固有规律、美学理念、观看方式以及批评反馈的全过程都发生了或大或小的改变。有相当数量的地方戏曲剧种，如黑龙江省的龙江剧、吉林省的吉剧等都以抖音开设演出预告、折子戏或全程直播的方式，进行线上宣推。曾经只在舞台上表演的演员名角，都适应了互联网新媒体手段，特别注重调动新媒体表现方式与观众形成新的观演关系。这也从

一个侧面提示我们，在地方戏曲人才培养过程中，除了要重视传统戏曲专业素养外，还应结合当下媒介特点，对人才的专业素养构成进行新的思考，使地方戏曲中包孕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以新的姿态走近观众，走向人民。

新的时代背景下地方戏曲的创作，不仅应自觉地扎根传统，扎根地方特色，树立文化自信，重视中国戏曲独特表演体系，还要积极向古典优秀戏曲作品学习、向经典传统戏曲剧目学习、向优秀新编戏曲剧目学习，努力在选题方面做到与时俱进，回应生活热点。需要创作者通过对全新艺术理论的学习，熟练掌握并运用各类创作的新手法，这样才能最终形成令人欣喜的作品。

地方戏曲的发展不仅是创作等戏曲内部的因素在起作用，同时也受到戏曲外部条件的影响。文艺发展方针、文艺理论和与之相关的行政政策等这些外部要素，也在推动着地方戏曲的调整，包括戏剧学校、戏剧团等在内的诸多机构，需通过外部要素作用的有效发挥，激活其培养人才的有效机制。应对各类表演人员进行目标培养，打造名家名角，构建艺术人才的合理、科学结构，培养优秀的戏剧团管理人才，实现戏剧团艺术人员的年轻化、管理团队的专业化，形成戏曲艺术人才合理、有序流动的机制。

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人才培养环节，就是后备人才培养系统的建立。这需要通过学校课堂、运用校园艺术课堂机会，为戏曲发展奠定人才基础。地方戏曲进入中小学课堂，戏曲教育进入中小学课程体系还有待政策、奖金、教学队伍等因素的推进，部分地区率先采用的“高参中、高参小”、院团下沉学校等教学模式，还有待推广。只有充分重视青少年的戏曲教育，才能为地方戏曲的人才培养与有效传播提供人才保障；也唯有这样，才能使地方戏曲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使命得以实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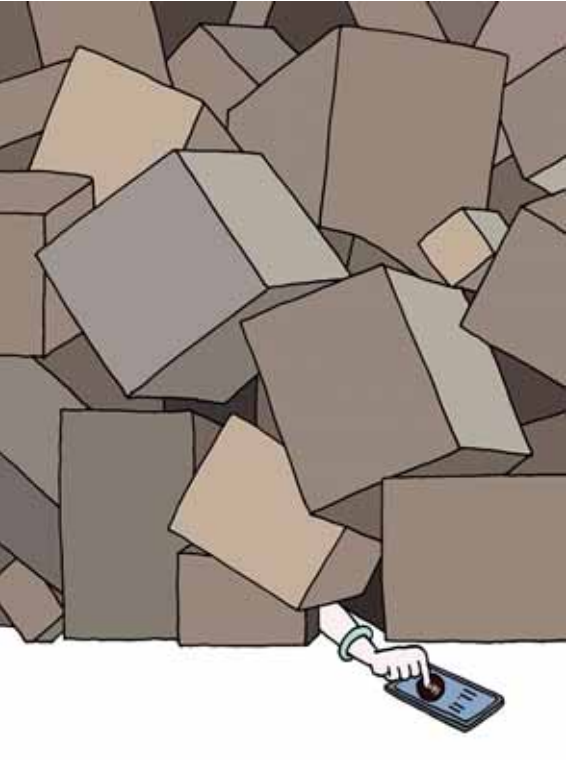
（据《光明日报》）



“乱花渐欲迷人眼” ■蒋跃新



直播带货 ■韦荣景



难以停“指” ■尚军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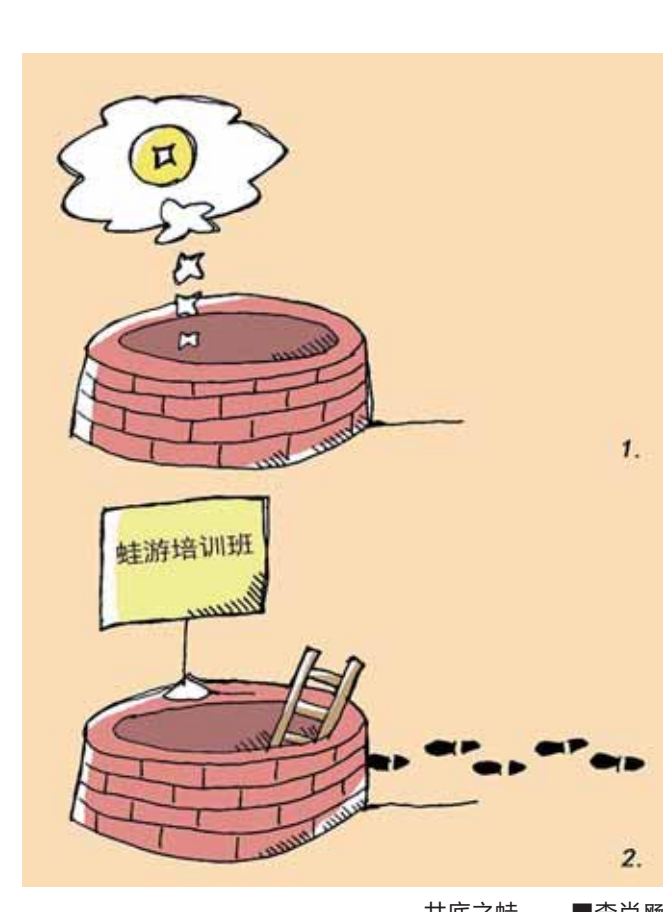
拦不住 ■祁雪峰



直播 ■宋旭升



多买多“优惠” ■焦雅琦



井底之蛙 ■李肖颍



我的一天 ■王永琦



狂潮来袭 ■刘志永



困惑 ■杨树山

漫画天地

投稿邮箱：1169447255@qq.com